

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探讨 ——以广东侨乡为例

彭黎明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海外华资; 直接投资; 侨乡; 经济效应

[摘要] 包括港澳台资本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华侨资本在内的海外华资, 一直是中国外资引入的主力军, 对中国大陆, 尤其是广东侨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广东侨乡为例, 论述了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进程, 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 试对这一资本流入进程进行理论阐释。而且, 通过对广东侨乡的分析, 探讨海外华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2)04-0029-09

Studies on the investment of overseas capital in Qiaoxiang: On the case of Guangdong Qiaoxiang

PENG Li-ming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apital; direct investment; Qiaox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including that of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the main investor in China since 1980, has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in particular Guangdong Qiaoxiang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Through the case of Guangdong Qiaoxiang,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nvesting process of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in Qiaoxiang.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it tries to explain theoretically this kind of investing process.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 which the investment of overseas capital has brought about.

一 前言

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后, 在港澳两地的华人资本首先进入邻近的广东、福建侨乡。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也紧随其后。八十年代末, 台资也开始流入这一带的侨乡。二十多年来, 这些具有种族、文化等特征的华人资本, 大量涌入中国东南侨乡及沿海城市, 成为中国引入外资的主力军, 对中国大陆, 尤其是广东侨乡的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 国际学术界对大陆以外的华人资本研究时, 经常使用海外华资 (Overseas Chinese

[收稿日期] 2002-06-10

[作者简介] 彭黎明 (1976-), 男, 江西遂川人,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侨乡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Capital) 这一统一概念, 它泛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资本, 它包括港澳台资本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华侨资本。运用这一整体的概念, 对于研究港澳台资本和东南亚等地华人资本对侨乡投资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 能够比较恰当地进行论述和解释。这是因为, 首先, 根据中国政府的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 港澳台同胞与东南亚等地华人华侨的投资享受同等待遇, 具有同等地位, 都是属于外商投资的组成部分; 其次, 东南亚等地的许多华人企业先是进入香港, 以香港为据点, 然后投资于中国内地, 很难把他们具体区分为港资还是东南亚华人资本。而且, 在中国投资的华人资本中, 港澳台资本基本上占 90% 以上, 来自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比重很小, 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对此没有详细的分类资料; 另外, 广东、福建一带是中国传统的侨乡, 是港澳台同胞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共同的祖籍地, 他们之间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因此, 把海外华资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 既反映了中国外资政策的现实, 也有利于对海外华资的投资进行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本文以海外华资作为分析概念, 探讨其对东南沿海侨乡的投资进程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 并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投资活动进行阐释。

二 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

自 20 世纪 60 年代, 特别是 70 年代来,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增长, 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8% 以上,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与韩国一道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 一跃而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之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80 年代, 海外华人华侨的主要聚居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在东亚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的这一时期, 华人经济实力急剧增长, 他们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最大受益者。1996 年 11 月 4—11 日的香港《亚洲周刊》刊载了上市值在 1.85 亿美元以上的“国际华商 500 家”的资料。这 500 家华商的资产市值高达 8000 多亿美元, 充分显示出华人资本的雄厚实力。^[1] 另据世界银行估计, 大陆以外的华人年产值 1991 年为 4000 亿美元, 1996 年达 6000 亿美元。^[2]

1979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 中央政府的侨务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开始欢迎和鼓励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投资大陆, 并在随后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 华人资本的投资属于外商投资, 享受外资身份。为此, 以 1979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开端, 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6 年通过, 1990 国务院颁布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 年) 等一系列关于外资经营等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并出台了不少针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投资的优惠政策, 如 1988 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0 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以及 199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些法律法规表明, 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可享受比一般外商更优惠的投资条件。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特别是广东、福建侨乡相继制定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和法规, 如 1987 年广东省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实施方法》等。

80 年代初, 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地设立经济特区。1992 年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时说: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 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 深圳毗邻香港, 珠海靠近澳门, 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人多, 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由此可见, 这一举措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吸引华人华侨前来投资, 这可以从早期进入特区投资的外商资金几乎全是海外华资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1984 年, 包括广州、福州等在内的沿海 14 个城市及海南岛实行对外开放。之后, 东南沿海以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为中心, 周边的侨乡地区连片成面, 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改善, 由于同文同种和共同习俗的特征, 加上海外同胞对祖国和家乡的亲情纽带, 海外华资大规模投资大陆尤其是侨乡已经水到渠成。

海外华资是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 早期他们的投资以“三来一补”的形式为主。80 年代中期以后, 海外华资的绝大多数采取合作、合资、独资等的形式进行直接投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海外华资的投资总额呈逐步上升趋势。纵观 20 年来，海外华资对中国的投资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1 年为第一阶段，是海外华资在中国投资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批准利用外资协议金额 1214.7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796.27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 268.85 亿美元，港澳台资本为 179.32 亿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66%；1992—1997 年为第二阶段，是海外华资中国投资的飞速发展时期。在此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 1968.1 亿美元，为第一阶段 13 年间外商实际投资总和 268.85 亿美元的 7.3 倍。其中，海外华资占 1276 亿美元，约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65%；1998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海外华资在中国投资的成熟发展时期。至 2000 年的三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1718.9 亿美元，其中海外华资 1094.6 亿美元，约占外资总数的 63.6%。^[3] 从以上统计表明，在中国引入外资的 20 年来，海外华资一直是外资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港资又占据着绝大部分。截至 2000 年 6 月底，中国内地共吸收港资项目 188214 个，合同港资金额 3173.12 亿美元，实际使用港资 1612.94 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内地吸收外资总数的 53.6%、49.8%和 49.7%。目前香港仍为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4]

海外华资较早进入的地区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侨乡，而其中的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等则成为最受青睐的投资地。以中国第一侨乡的广东省为例，根据下表统计显示，1979 至 2000 年，海外华资直接投资协议额为 1411.5079 亿美元，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协议投资总额的 82.8%和 20.87%，海外华资实际利用金额为 811.5196 亿美元，占广东省和全国实际投资总额的 82.1%和 23.29%。在第二大侨乡的福建省，截止到 1998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270 多亿美元，其中 70%源于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而且，进入福建的海外华资带有明显的亲缘色彩，投资者绝大多数是福建籍海外同胞。^[5]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关于海外华资的统计数额仍然偏低，毕竟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也有不少华人资本。更重要的是，自 1996 年台湾当局实行“戒急用忍”政策后，台资大量通过第三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进入大陆。截止到 2000 年，广东省共吸收来自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投资额分别为 48.37 亿美元和 1.98 亿美元。^[6] 因此，海外华资的实际投资数额和比重均要高于上述统计。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统计一览表

(1979—2000 年)

单位：亿美元

来源地 金额	香港	澳门	台湾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总计
协议外资额	1234.47	49.2552	61.5713	45.8632	11.0962	4.9744	3.5726	0.705	1411.5079
实际使用外资额	718.7685	23.9892	36.4252	23.3023	4.0632	2.4717	1.9592	0.5403	811.5196

投资于广东省的海外华资在广东省及全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

类别 投资金额	海外华资 (广东省)	广东省外商 直接投资额	占广东省比重	全国外商 直接投资额	占全国比重
协议外资额	1411.5079	1704.7341	82.8%	6763.74	20.87%
实际使用外资额	811.5196	988.1827	82.1%	3484.03	23.29%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01 年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由于东南亚各国的投资主要以华人资本为主，因此本文海外华资的统计额主要包括港澳台资本额和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投资总额。

三 海外华资流入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高达数千亿美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热潮。而作为传统侨乡的广东、福建，则吸收了绝大多数的海外华资。对于这些以文化、种族为联系纽带的华人资本的投资活动，如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阐释呢？这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的外资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外间接投资，包括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政府贷款、国际融资租赁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在国外市场发行的各种债券；二是外商以合作、合资或独资等形式进行的直接投资。海外华资从流入的特征来看，则基本上属于外商直接投资。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国或地区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或地区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我们称之为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海外华资而言，东南亚华人资本的投资无疑是一种跨越国界的资本流动。而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在中国法律上享受外商投资身份，与外国资本享受的投资待遇无异。因此，从经济特征来看，它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意义的国际资本流动（本文只在资本层面使用海外华资这一概念，探讨海外华人资本投资活动的经济意义，并不涉及其他政治涵义）。本文试以海外华资的投资为一个整体，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和考察，以期更能反映海外华资流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简述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学派众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主要有：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微观主流优势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威尔士的小规模技术理论等。微观主流优势论是以研究发达国家间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为主的理论，涵盖众多流派，如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77年，邓宁吸取各家之长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三方面决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前两方面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后者则是充分条件。这一理论充分解释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

1970年代中后期，针对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他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实物资产、技术和劳动力等）也存在差异。一国某产业的密集度较高的那种要素相对价格上升，会使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状态，这时应该将该产业转移至那种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导致要素组合合理化，增加东道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他提出，一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7]

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发展，于是相继出现了许多研究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其中以威尔士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为代表。威尔士认为不仅大规模生产中的现代化技术是企业的竞争优势，适合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也同样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很多是为了满足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形成“民族纽带”性的投资，独特的文化特色有时也是竞争优势所在。另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采用低价策略，不需要高昂的广告费用，以物美价廉为特色，这是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8]

（二）海外华人资本流入的理论阐释

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微观主流优势论主要以欧美国家为背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其针对范围过于狭窄，不足之处明显。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以国家为基本考察单位，通过国际间的优势比较及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来说明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及给投资国和东道国所带来的利益，我们称之为国际直接投资宏观理论。威尔士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是一种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为对象，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相对化、动态化的微

观理论。因此，海外华资的流入，依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和分析。

首先，从边际产业扩张的宏观方面来看。从60年代起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到80年代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特别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由于东盟各国的赶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出口主导工业化陷入困境。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以低廉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支柱，一旦劳动力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趋于上升，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沦为比较劣势产业。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势在必行，必须培养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香港为例，其四大支柱产业是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旅游业。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曾经为香港的繁荣贡献极大。进入70年代，由于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这种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业竞争力减弱。为此，这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香港的制造业大举向毗邻的广东、福建等地区北移，约八成的香港厂商在内地设有生产设施，聘用数百万内地工人，形成了香港设计、开发、营销、服务和内地进行产品生产加工的“前店后厂”格局。另外，以土地资源开发和建设为内容的香港房地产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得不面临着土地等生产要素高昂的成本。香港的土地面积仅为1097平方公里，内地的土地资源富足，但基础设施落后，急待开发和建设。因此，以香港华人地产商为代表的华人资本大肆进军内地的酒店宾馆等房地产行业的开发和建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主要侨乡的广东省，1979至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协议金额达1430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为807亿美元，分别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3.9%和80.7%。^[9]在两个产业的投资，其主体为港资为主的海外华资。上述例子表明，由于一些相关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上升，香港的一些产业或丧失比较优势，或处于相对饱和状态，随着这些所谓的边际产业的北移和扩张，形成互补优势，又重新焕发了发展活力。因此，这种产业的转移，既让香港华人资本从比较优势中获巨大发展和丰厚利润，又使香港保持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另外，从微观层面来看，威尔士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释。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基本上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不仅规模小，而且资本投入额也较少。从投资形式来看，八十年代华人资本投资是以合资的形式为主，到九十年代独资企业开始占据较大比重。从整体来看，合资企业规模一般较大，独资企业依然较小，但仍以中小型企业居多。这可从台商投资最多的广东省的侨乡之一东莞市得到佐证。截止到2000年1月，东莞市共吸引4147家台资企业，台商实际投资33.93亿美元，平均每家企业的投资额为81万美元。^[11]早期进入内地的中小型企业，大多从事以出口加工为主制造工业。这种以中小规模的生产水平和技术能力为主的投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不高，因而在内地具有广泛的适用能力。同时，利用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的税收优惠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出口加工型的中小型企业可以相对灵活的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规避风险，形成竞争优势。而且，从海外华资投资的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其制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在大陆可以找到一定程度的内销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开放之初，由于受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海外华资的投资在整体上呈现出小规模技术水平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华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开始实现不同程度的升级，表现出追赶一流技术水平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威尔士的理论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地区）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可以利用种族联系，发挥“种族纽带”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体现为企业在同一种族群体的地区提供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与东道国的同一种族群体的企业或个人合资合作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威尔士的这一观点从海外华资对中国大陆侨乡投资的事例中得到进一步验证。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海外华资主要投向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潮

汕地区、福建的闽漳泉三角地区。这些地方是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中国著名的侨乡。海外华资投资侨乡，投资者与当地民众不但语言、生活习俗相通，而且对家乡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可获得亲朋好友协助。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期大陆投资环境尚不完善时，人际关系对海外华资更显重要。^[19]其次，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接壤，闽南和潮汕都是沿海地区，厦门和汕头向来都是出入境口岸，与海外交通方便，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便利程度非内地其他地方能比。同时，侨乡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无疑对海外华资更增添了吸引力。因此，侨乡在地域、交通以及语言、习俗等人文环境方面具所有的优势，对海外华资利用种族联系，增强投资优势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 海外华资投资对侨乡经济发展的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最大的侨乡——广东省，其属下的顺德、东莞、江门、台山、中山、南海、潮州、汕头、梅州等县市，相继被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或从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在海外华资投资的推动下，这些重点侨乡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冲浪前行，侨乡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和壮大，逐步从祖辈集居的乡村和集镇，走向了新兴的城市。因此，海外华资的投资对广东等侨乡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效应。以下从资本、贸易、技术、创造就业及制度创新五个层面对海外华资流入侨乡的效应进行论述。

(一) 资本效应

钱纳里(H.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N. Stout)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储蓄、外汇不足的双重缺口，形成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从而造成国内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制约经济发展。外资的引入，无疑能填补储蓄、外汇两大缺口，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和总额，从而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等侨乡向来缺少政府投资，其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实行引进外资政策后，华人资本成为侨乡建设资金筹措的重要来源，大大弥补了经济发展资金的不足。从下表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商投资占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以上。1991年，尽管该比重为最低点的14.2%，但相当于全国同类比重的近5倍。在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最高点：29.57%，但仍然相当于全国同类比重的近3倍。另外，广东省的外商投资额与GDP之比在1994年为17.93%，是90年代来最高，尽管之后比重有些降低，但这一比重仍为全国同类比重的近3倍。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GDP的成长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为侨乡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不仅加快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步伐，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GDP以两位数(13.6%)的高速增长贡献很大，形成了良好的资本效应。

(二) 贸易效应

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最明显的是影响贸易的规模、绩效与结构。早期进入广东侨乡的海外华人和港澳台投资“三资”企业，大多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紧随而来，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在珠三角地区大量涌现。这些以出口创汇、面向国际市场为指向的外商投资，迅速扩大了广东省对外贸易的规模，使广东省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从下表来看，90年代以来，广东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1的176亿多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733亿多美元，增加了3倍多，其中进口额增加3.5倍，出口额增加大约4倍，出口的增长幅度超过了进口。1991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省总额的33.62%，到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55.46%，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0%以上。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所占比重与全国同类相比，要高出5%至12%左右。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资企业以出口为导向，凭借其拥有的品牌声誉或销售网络，使广东迅速加入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中。而且，外资企业带来

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广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对外贸易的规模。此外，外商投资企业也通过“产业后向关联效应”带动省内甚至国内企业的间接出口，从而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广东省同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及与全国同比统计一览表（1991—1999 年）

年份	FDI (亿美元)	FAI (亿元)	GDP (亿元)	美元平均 汇价	FDI/FAI (%)	全国 (FDI/FAI)	FDI/GDP (%)	全国 (FDI/GDP)
1991	18.2286	478.20	1893.30	5.32	14.20	2.91	5.12	1.07
1992	35.5150	921.75	2447.54	5.51	14.86	5.25	8.0	2.28
1993	74.9805	1629.87	3431.86	5.76	18.55	8.49	12.59	4.58
1994	93.9708	2141.15	4516.63	8.62	26.48	11.96	17.93	6.22
1995	101.8028	2327.22	5733.97	8.35	25.57	10.95	14.82	5.36
1996	116.2362	2327.64	6519.14	8.31	29.05	10.59	14.82	5.11
1997	117.1083	2298.14	7315.51	8.29	29.57	10.53	13.27	5.04
1998	120.2005	2668.13	7919.12	8.28	26.11	9.28	12.57	4.80
1999	122.03	3027.56	8464.31	8.28	23.36	7.83	11.94	4.08

注：FDI 是指广东省外商实际投资额，FAI 是指广东省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是指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据调查，外商大约把 70% 的投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因此 FDI/FAI 的 FDI 值是以外商实际投资额的 70% 来计算的。参见王洛林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年）。另外，全国 FDI/FAI 的值也是以此标准的计算出来的。

资料来源：参见《广东省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

以进出口增长的贸易绩效而言，广东省外资企业进出口贡献率一直比较高，这一比重在 1995 年达到 129.78%。甚至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的 1998 年，虽然广东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负增长，但外资企业进出口贡献率仍然达到 111.49%。另外，外商投资企业所带动的贸易行为，使广东省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由于出口加工企业的大量存在，广东省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渐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外资企业的加工性质，造成原材料的进口大量增加，一部分原需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实行替代，从而使得进口贸易的结构也发生改变。

广东省外资企业的进出口与全省进出口比较、全国同类比重
及贸易绩效分析（1991—1999 年）

年份	外资企业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全省企业进出口 总额 (亿美元)	外资企业占全省 额比重 (%)	全国同类比重 (%)	广东外资企业 贡献率 (%)
1991	176.58	525.21	33.62	21.25	54.12
1992	248.17	657.48	37.75	26.42	74.33
1993	341.80	783.44	43.63	34.27	60.28
1994	452.22	966.63	46.78	37.04	109.29
1995	532.10	1039.72	51.18	39.10	129.78
1996	609.81	1099.60	55.46	47.30	42.47
1997	695.42	1301.2	53.44	46.94	-111.49
1998	709.01	1297.98	54.62	48.67	23.30
1999	733.36	1403.68	52.25	48.39	62.68

注：外资企业贡献率 = (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量 / 全省进出口增长量) × 100%。资料来源：参见《广东省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0）。

（三）技术、管理效应

对于中国来说，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往往是引进外资的重要目的。1992 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外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是，它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果 (spill-over effect) 提高东道国要素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促进研究与开发，引起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水平等，间接作用则要通过与当地研究与开发机构合作，向当地前向或后向产业的合作者

转移技术，并与当地增加培训人员的总数。^[12]

到2000年底，广东省共拥有5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和3万多家加工装配企业，这些企业带来了一大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工艺。通过外资企业内部的技术扩散，以及前向与后向关联产业的技术外溢，使得广东省的众多产业实现升级换代。通过外资企业的带动，如今广东省在轻纺、电子、塑料、家电、食品、机械、建筑、陶瓷等行业实现了技术改造，造就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华资投资的许多企业尽管技术并非一流，但适用性强，投产速度快，容易形成生产能力。近年来，海外华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项目的投资出现逐渐增长的趋势。另外在管理方面，外资企业通过组织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了国内员工的管理和技术能力，培养了大批熟悉和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和管理经验的劳动力，并带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 就业效应

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对就业市场造成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人数。同时，外资企业的引进，常常带动产业关联性，引发工资的乘数效果，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20年来，广东省的“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企业不但消化了大批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而且为城镇居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下表所示，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渐下降，而广东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1999年港澳台与其他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43.84万，占全省企业就业人数的16.78%。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同类比重，是后者的10倍以上。因此，外资企业今后在吸纳就业方面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国有及其他企业。随着外资企业的发展，带动大量企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如今，广东侨乡人民生活早已步入小康水平，走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先列，正在向现代化迈进。

广东省外资企业与全省企业就业情况比较及全国同类比重

(1992—1999年)

年份	全省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比重(%)	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比重(%)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万人)	比重(%)	全国外资企业同类比重(%)
1992	858.12	559.71	65.23	55.53	6.47	19.63	2.29	0.37
1993	877.16	563.63	64.26	62.95	7.18	21.24	2.42	0.48
1994	879.84	551.00	62.63	69.43	7.89	28.85	3.28	0.60
1995	911.90	548.98	60.20	93.32	10.23	35.34	3.88	0.76
1996	904.07	551.82	61.04	89.18	9.86	39.92	4.42	0.78
1997	897.32	544.46	60.68	95.63	10.66	42.38	4.72	0.84
1998	884.80	510.86	57.74	99.54	11.25	38.82	4.39	0.84
1999	857.08	489.07	57.06	103.21	12.04	40.63	4.74	0.87

注：全国外资企业同类比重是按照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与全国企业就业人数之比计算得来。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0)。

(五) 制度效应

外商投资企业的涌入也引发一些经济制度方面的效应，表现在：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和推动国内经济的国际化。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外资企业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经济管理体制，包括价格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外汇体制等的改革。在经济国际化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较高，其示范效果带动本土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生产经营方式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带动了本土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并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向国际惯例接轨。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商投资，对广东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国际化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广东外贸出口占全国的 1/3 以上，全省的工农业总产值的 40% 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东经济将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一些学者在谈到海外华资投资带来的经济效应时，也提出不少相关问题，如外资企业规模较小，中小资本居多；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缺少高新技术；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多集中于加工工业；企业的投机性较强等等。但综观海外华资对大陆，尤其是对广东侨乡的投资，其带来的经济效应是极其显著的。正如朱镕基总理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他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参考文献

- [1] 郭梁. 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05).
- [2] [3] [5] [10]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 377—380, 398, 383).
- [4] 外经贸部外资统计数据.
- [6] 广东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7] 杨宇光. 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 [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18)
- [8] 威尔士. 第三世界跨国企业 [M].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4.
- [11] 封小云. 关于台商投资的调研报告 [J]. 经济前沿, 2001; (10—11) 26.
- [1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 United Nations 1992).

《欧洲华侨华人史》出版

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李明欢教授历时五年精心撰写的《欧洲华侨华人史》于本年 7 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面世。该书被列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十五，由龚诗贻基金赞助出版，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全面地论述欧洲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全书洋洋 70 余万字，除导论、结语之外，共有 7 章。作者以欧洲华侨华人在 20 世纪的百年历程为论述重点，在综合思考欧洲华侨华人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欧洲社会的重大事变及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华侨华人的影响三大因素之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从时序上将 7 章的内容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开端篇、立足篇与发展篇。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开端篇，追溯了中国人远赴欧洲之源起及其如何以异族小群体的形象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中艰难求生。立足篇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是欧洲华侨华人历经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并在“冷战”格局下随着欧洲复兴的历史进程探寻新的适应，追求新的崛起的重要时期。发展篇为第五至第七章，是本书内容最为丰富的组成部分，其中第五章追踪当代欧华人口构成的最新变化，第六章剖析其经济活动，第七章解读其社会整合进程，向读者深刻而全面地展示了当代欧华社会的最新风貌。此外，作者在导论中梳理了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国际移民理论，评述了国内外“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状况。书末的五个附录，收入了作者归纳整理的“欧洲华侨华人历史大事年表”、“欧洲主要中文报刊一览表”、“欧洲华侨华人人人口统计资料”、主要参考书目及作者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其它系列论著，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本书较高的学术水准。（晓迪）